基于WE多元主义的福祉政策评估方法论

Takeshi Kato

摘要

需要澄清的是，如何评估和选择有助于多元人群福祉的政策。为弥合客观指标与福祉相关政策之间的鸿沟，本研究从基于客观指标的构成多元主义转向强调主观语境的概念多元主义，从主体—客体多元主义发展到个体—群体多元主义，再发展到WE多元主义，并提出一种基于政策多元性、结合联合事实查明的新政策评估方法。首先，为了评估涉及多元利益相关者的政策，我从个体主体性—客观性发展到个体主体性与群体主体间性，进而转向“I—家庭—社区—市—国家—世界”这一梯度中的狭义—广义WE多元主义。此外，参考若干福祉函数形式，我构建了福祉对狭义—广义“我们”的依赖关系。最后，鉴于政策本身包含社会、生态和经济价值的多元性，我针对每一种狭义—广义“我们”定义一个政策集合，并考察二者之间的映射，以提供评估依据。此外，通过将福祉与围绕狭义—广义“我们”共识的联合事实查明相结合，构建了政策评估方法。本文将事实—价值组合参数系统、综合政策制定方法和综合影响评估作为实施示例予以介绍。本文通过弥合哲学理论与基于WE多元主义的政策之间的鸿沟，并提出一种基于主观语境和共识构建的新政策评估方法，为实现福祉社会作出贡献。

关键词：福祉、策略评估、WE多元主义、共识构建、联合事实查明。

1 引言

政策对于提升**福祉**至关重要，全球各地都需要这样的政策 [1,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幸福经济联盟（WEAll）提出了一种以福祉为导向的经济模式 [3,4]。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5] 将“人人享有健康与福祉”列为目标3。日本的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 [6] 和智慧健康城市倡议[7] 旨在提升福祉。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生产和收入等经济指标十分重要，因为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满足基本需求。然而，随着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人们有必要开始关注与生活感受、社会关系等非经济因素相关的福祉 [1]。

目前已经开发出多种指标，用于评估有助于福祉的政策，包括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经合组织的美好生活指数，以及 WEAll 的快乐地球指数 [8]。然而，在构成经合组织美好生活指数的福祉指标中，收入、住房、健康、教育、环境和安全等客观指标，并不一定与各国的主观生活满意度排名相对应 [9]。日本为其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制定的宜居福祉城市指标 [10], 发现，在 1021 个自治市中，22 类客观指标与 33 类主观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很低 [11]。换言之，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之间存在差距，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应如何评估政策。

Mitchell 等人探讨了福祉的科学与哲学 [12]。福祉科学包括**测量多元主义**：一种通过选择多种指标来测量福祉构念的立场；以及**方法论多元主义**：一种主张将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不同方法并行运用或加以结合，同时选择构念并确定测量方法的立场。测量多元主义认为，上文所述的福祉指标和宜居福祉城市指标不能成为普遍适用的黄金标准；方法论多元主义则不仅要求多样化地选择指标，还要求在心理、文化和社会层面结合运用各种定量与定性方法。

与这些科学相比，福祉哲学包含**构成多元主义**：一种认为福祉由多个彼此不可还原的要素构成的立场；以及**概念多元主义**：一种认为适当的福祉概念取决于人们的事实、环境和目标所处的**主观与社会语境**的立场。构成多元主义试图基于一系列善或指标来全面解释福祉，而概念多元主义则认为，这些构念因人而异，或因人生不同阶段而异。如果构成主义者修正构成多元主义，将其调整为根据不同语境涉及不同构念的立场，那么它与概念多元主义便几乎没有区别。随后，Mitchell 等人提出，科学的方法论多元主义

承认哲学的建构性概念，同时，哲学的概念多元主义必须承担起面向社会实践的科学方法论，并将二者结合起来。

即使为简化起见，将福祉的构成限定为主体和客体，根据石田的观点，仍存在**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和**主体—客体多元主义** [13]。主体—客体多元主义认为，个体的主观态度与独立于这些态度的客观价值所构成的混合体，有助于提升福祉。这可以被描述为构成多元主义与概念多元主义的混合体。根据主体性与客观性是否得到对称处理，它还可进一步分为对称多元主义和非对称多元主义。在对称多元主义中，可能出现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分离的情况。然而，在石田提出的非对称多元主义中，主观态度是一个取值包含正值和负值的单调递增函数，客观价值是一个取正值的函数，而福祉则被表述为这两个函数的乘积，以避免出现相分离的情况。

根据 Mitchell 等人和石田的分类，上文提到的 OECD 福祉指标与日本宜居福祉城市指标，从科学意义上看属于测量多元主义和方法论多元主义，从哲学意义上看则属于构成多元主义和主体—客体多元主义；这是因为它们使用多个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以及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对多个国家和自治市的福祉进行比较。在这些指标中，概念多元主义所涉及的人们所处的情境要么未被纳入考量，要么被隐含地假定为指标使用者会结合具体情境加以使用。

客观指标在比较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设施是否充足方面具有一定意义，但问题在于，如前所述，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之间存在差距。政策涉及资金和人员等客观要素的投入，但即使依据客观指标实施政策，也未必能带来主观福祉。换言之，为了实施有助于提升福祉的政策，需要依据与主体性相关联的指标对政策进行预先评估和筛选。这一立场倾向于主观主义；若考虑语境，则意味着从构成多元主义转向概念多元主义。

另一个问题在于，政策的制定涉及的**共识构建**并非由单一个体完成，而是由众多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群体共同参与。此外，还要求在情境分析和未来预测方面具备理性，在成本和时间方面兼顾效率，并确保达成共识后的稳定性[14]。换言之，即使基于与主体性相关的指标对政策进行评估，也必须公平地考虑各种不同的主体性，由此引出了对**个体—群体多元主义**的新考量。此外，政策本身涵盖了资金、人力、时间、效果及副作用等多种要素，因此必须考虑**政策多元性**。构成要素之间不同参数的组合将产生大量政策提案。仅凭主体性很难从中选出一项政策，因此，有必要引入客观指标。

更多。此外，如果要以理性和效率来说服大量利益相关者，则需要**联合事实查明**[15]。因此，有必要基于共识评估有助于福祉的政策，再次纳入主观指标和客观共同事实，并在尊重主观语境的同时将其与联合事实查明相结合。

本文旨在弥合福祉指标与福祉政策之间的鸿沟，并提出一种评估有助于提升福祉的政策的方法。为此，我首先采取方法论多元主义和主体—客体多元主义的立场。为纳入概念多元主义（主观语境），我以群体主体间性取代客观性，从而推导出个体—群体多元主义。随后，我以“作为‘我们’的自我”这一观点为基础，将个体主体性和群体主体间性进一步发展为一种新的**WE多元主义**。然后，在考虑我们多元性的基础上，我尝试将主体间性与客观性的联合事实查明重新引入WE多元主义，并据此构建一种评估福祉政策的方法，同时兼顾政策多元性。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章首先介绍石田的主体—客体多元主义公式，并通过个体—群体多元主义将其拓展为WE多元主义，纳入倾向于主观主义的概念多元主义。第三章通过纳入政策多元性，进一步拓展WE多元主义。我在“狭义—广义‘我们’”中构建共识，并提出一种结合共识构建与联合事实查明的政策评估方法。随后，我基于这一政策评估方法介绍三个实践案例。最后，第四章总结本文结论，并讨论未来的问题。

2 WE多元主义

2.1 从主体—客体到个体—群体多元主义

首先，我将其称为主体—客体多元主义。这一立场认为，主体性与客观性彼此独立，而个体 p 对政策 x 的主观态度与独立于该态度的客观价值相结合，有助于提升福祉。基于伍达德的分类[16], , 石田将主体—客体多元主义表述如下[13]。

> **主体—客体多元主义**：(1) 如果某个个体 p 对 x 持有积极态度，且 x 具有独立于 p的积极态度的善性，那么 x 有助于提升 p的福祉。(2) 如果某个 p 对 x 持有消极态度，且 x 具有独立于 p的消极态度的恶性，那么 x 损害 p的福祉。

令 p 针对 x 的主观态度为 $W_s(x,p)$，与之无关的客观价值为 $W_o(x)$。那么，福祉 $W(x,p)$ 可以表示为如下最简表达式[13]。

$$W(x,p) = W_s(x,p) + W_o(x) \tag{1}$$

现在，我想重新思考不依赖于主观态度的客观价值。正如第1章所述，客观价值的指标并不一定与主观福祉相关。让我再重新思考一下，客观价值是根据某些数据计算得出的。根据 Deguchi 的说法，即使是被视为最客观的物理常数，也是通过结合各种物理测量和统计处理的确定性竞争得出的，而支撑统计处理的假设并无依据，只是作为协作努力的结果而被接受 [17,18]。根据 Otsuka 的说法，在数据处理中，其前提包含关于概率模型世界本体论的假设。概率模型存在不同的语义解释，即主观主义和频率主义，而为结果提供正当性的决策则基于认识论信念 [19]。

鉴于这些考量，客观价值是指经由许多人共同努力和解释而被判定为正确的价值，也可以将其视为一个群体的主体间性。换言之，主体性和客观性分别被定位为个体主体性和较大群体的主体间性，主体—客体多元主义则被个体—群体多元主义所取代。

个体—群体多元主义：如果个体 p 对 x 具有主观价值，而群体 g 对 x 具有主体间价值，那么 x 就有助于 p 和 g 的福祉。（省略关于负价值的析取情形。）

将方程（1）中的客观价值 $W_o(x)$ 替换为群体 g 的主体间性 $W_{is}(x,g)$ 后，个体—群体多元主义中的福祉 $W(x)$ 可表示如下。

$$W(x) = W_s(x,p) + W_{is}(x,g) \tag{2}$$

在此， $W_s(x,p)$ 和 $W_{is}(x,g)$ 不一定由相同的要素或方法论构成。即使要素相同，也可以考虑个体 p 和群体 g 的语境而将其舍弃。从这个角度来看，方程（2）可被视为方法论多元主义和概念多元主义。此外，个体 p 的主体性与群体 g 的主体间性有所不同，这种情况确实可能发生；在此，我并不打算提出一种能够避免二者之间出现分歧情形的表述。

2.2 从个体—群体到WE多元主义

接下来，我将考察个体与群体。Deguchi 将“作为“我们”的自我”描述为一种东亚自我观，这种自我观与老庄和禅宗思想一脉相承，有别于西方观点

“作为‘我’的自我”[20,21]。“作为‘我们’的自我”是一个多主体委托网络系统，涵盖“我”以及围绕“我”的其他人和事物。

从这一视角来看，主体性—客观性与个体—群体这两组二分不复存在，而是被置于诸如“我—家庭—社区—市镇—国家—世界”等层次之间的渐变关系中。个体—群体多元主义被“WE多元主义”取代，后者体现了“我们”的相对开放性与扩展范围；为简化起见，可以将两者概括为“狭义—广义‘我们’”多元主义。用Deguchi的话来说，这可称为个体—群体多元主义的“WE转向”。

WE多元主义：如果“狭义福祉”对 x具有主观价值，而“广义福祉”对 x具有主观价值，那么 x 便有助于提升“狭义福祉”和“广义福祉”。（省略有关负值的析取情形。）

将方程（2）中个体 p 的主观价值 $W_s(x,p)$以及群体 g 的主体间价值 $W_{is}(x,g)$，分别替换为“狭义福祉”的主观价值 $W_n(x)$和“广义福祉”的主观价值 $W_w(x)$，即可将WE多元主义表示如下。

$$W(x) = W_n(x) + W_w(x) \tag{3}$$

需要注意的是， $W_n(x)$ 和 $W_w(x)$ 不一定由个体—群体多元主义中所描述的相同元素构成，而是包含了概念多元主义的语境。即使“狭义福祉”包含在“广义福祉”之中，也正如个体 p 的主观价值 $W_s(x,p)$ 与群体 g 的主体间价值 $W_{is}(x,g)$ 可能存在差异一样，“狭义福祉”在其语境中对 x 所具有的主观价值 $W_n(x)$，与“广义福祉”在其语境中对 x 所具有的主观价值 $W_w(x)$ 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分别加以考虑，以表示整体福祉 $W(x)$。此外，两者也仅仅是从各种福祉形式中选取的两个代表。通过考虑多种不同的福祉形式，方程（3）可以扩展为一个多项式方程。每一项都是一个具有正值或负值的函数，而整体福祉 $W(x)$ 将随着用于汇总政策 x 在各类福祉形式下的价值的权重不同而发生变化。

为了直观展示 $W(x)$ 如何变化，我现在考察 $W_n(x)$ 和 $W_w(x)$ 的具体函数形式。图 1 展示了三种图示，描绘福祉研究中提出的典型函数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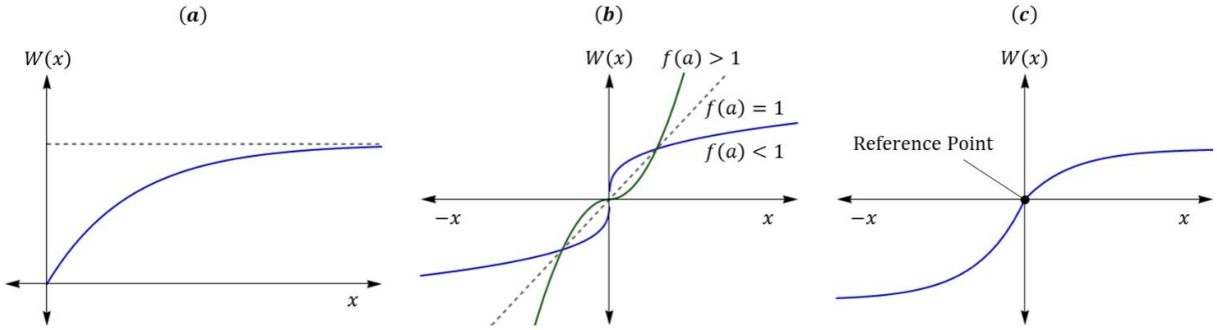

图 1。（a）Kagan、（b）Sarch 和（c）前景理论。

Kagan 使用函数的饱和形式来表示：相对于客观 goods 的愉悦增量 x ，福祉 $W(x)$ 的增量逐渐递减，如图 1(a) 所示 [22]。Sarch 则以净享受 x 为底数、以成就 a 的条件函数 $f(a)$ 为幂指数，表示相对于生活享受增量，福祉 $W(x)$ 增量的折减/膨胀，如图 1(b) 所示 [23]。究竟是折减还是膨胀，取决于 $f(a)$ 是否超过阈值 1。

$$W(x) = \begin{cases} x^{f(a)} & if\ x \geq 0 \\ -|x|^{f(a)} & if\ x < 0 \end{cases} \tag{4}$$

作为福祉函数形式，经济学中的效用函数和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中的价值函数可能会有所帮助。效用函数是一个表示效用大小与偏好之间关系的函数。将偏好理解为对 x 的积极态度或主观价值，并将效用理解为福祉，效用函数便可称为福祉函数。在前景理论中，价值函数与概率加权函数相乘以表示期望效用，而价值函数对应于一般经济学中的效用函数。前景理论采用一种非对称函数形式，其中价值函数以饱和或折扣形式表示，并且负福祉被感知为大于福祉，如图 1 (c) 所示。具体而言，已有研究提出了以下几种函数 [24]。

$$W(x) = \begin{cases} x & \text{Linear} \\ \ln(a+x) & \text{Logarithmic} \\ x^a & \text{Power} \\ ax - x^2 & \text{Quadratic} \\ 1 - e^{-ax} & \text{Exponential} \\ bx - e^{-ax} & \text{Lin.+Exp.} \end{cases} \quad if\ x \geq 0 \tag{5}$$

在这些函数中，通常使用幂函数形式（对应于 Sarch）或指数形式（对应于 Kagan）[24,25]。这里，考虑到关于收入（偏好）的福祉函数呈饱和形式 [1], ，并采用 Kagan 的指数形式，正向和负向 x 的非对称函数表示如下。

$$W(x)=\begin{cases}1-e^{-\alpha x} & if\ x\geq 0\\ -\lambda\left(1-e^{\beta x}\right) & if\ x<0\end{cases} \tag{6}$$

考虑到作为 WE 多元主义的“狭义福祉”和“广义福祉”具有不同的背景和主观价值，方程（3）中的 $W_n(x)$ 和 $W_w(x)$ 表示如下：x_n 和 x_w 是变量，α_n、β_n、λ_n、α_w、β_w和 λ_w 是系数，而 $r\ (0\leq r\leq 1)$ 是归一化权重。

$$W=r\cdot W_n(x_n)+(1-r)\cdot W_w(x_w) \tag{7}$$

$$\begin{aligned}W_n(x_n)&=\begin{cases}1-e^{-\alpha_n x_n} & if\ x_n\geq 0\\ -\lambda_n\left(1-e^{\beta_n x_n}\right) & if\ x_n<0\end{cases}\\ W_w(x_w)&=\begin{cases}1-e^{-\alpha_w x_w} & if\ x_w\geq 0\\ -\lambda_w\left(1-e^{\beta_w x_w}\right) & if\ x_w<0\end{cases}\end{aligned} \tag{8}$$

因此，可以看出W 相对于“狭义—广义‘我们’”的变化。W_n（x_n）和 W_w（x_w）都由多个元素构成，但假设它们分别汇总为单个变量 x_n 和x_w。为简化起见，二者的系数分别为 $\alpha_n=\beta_n=\alpha_w=\beta_w=1$ 和 $\lambda_n=\lambda_w=2$。设置 $\lambda_n=\lambda_w=2$ 的原因是为了表示福祉与不幸福之间的不对称性。图2展示了计算结果图。

在图2中，当 $x_n\to\infty$ 和 $x_w\to\infty$时，图形渐近于$W\to 1$ ；当 $x_n\to-\infty$ 和$x_w\to-\infty$ 时，则渐近于 $W\to-2$ 。如图2（a）–（c）所示，三维曲面的形状会根据“狭义福祉”或“广义福祉”的权重（r的值）而变化。也就是说，在（a）中，福祉由“狭义福祉”和“广义福祉”共同决定；而在（b）和（c）中，福祉几乎完全由其中一方决定。（d）展示了两者相等的情况，即两者达成共识，此时福祉的变化以曲线而非三维曲面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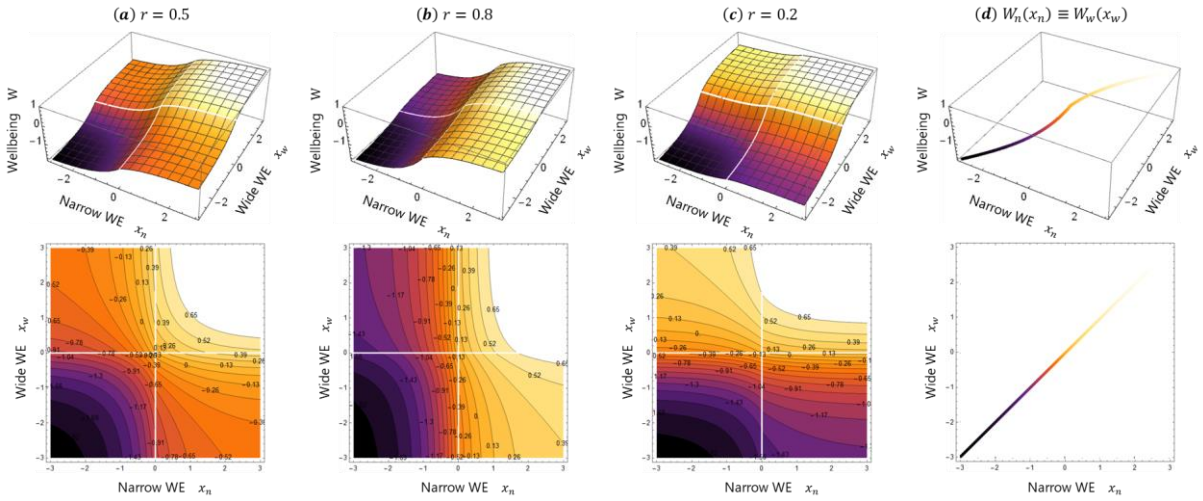

图2。“狭义—广义‘我们’”的福祉计算结果：(a) $r = 0.5$（“狭义福祉”和“广义福祉”对称），(b) $r = 0.8$（加权“狭义福祉”），(c) $r = 0.2$（加权“广义福祉”），以及 (d)$W_n(x_n) \equiv W_w(x_w)$（“狭义福祉”和“广义福祉”等值）。

3 政策评估方法

3.1 基于政策多元性与“我们”共识的策略评估

从WE多元主义中的概念多元主义视角来看，给定政策的“狭义福祉”W_n（x_n）和“广义福祉”W_w（x_w）要素具有多元性，并因情境而异。

案例A：引入自然能源的政策可能有助于提升福祉，但这不一定与降低能源成本、减少碳足迹、保护自然景观、增加当地经济循环等目标相一致。[26], 而且，随着“我们”范围的扩展，具体情境也会有所不同：个人—家庭—社区—市镇—国家—世界。

案例B：增强社会保障的政策可能有助于提升受保障人群的福祉，但这可能导致税收和行政成本增加、其他预算和人员受到挤压（教育、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社会正义遭到扭曲，以及工作积极性下降[27]。

考虑到政策多元性和背景，方程（7）可以改写并表示如下：令 X_n 和 X_w 为元素的集合，令 $\boldsymbol{x_n}$ 和 $\boldsymbol{x_w}$ 为分别由与“狭义福祉”和“广义福祉”相关的元素组成的向量。

$$W = r \cdot W_n(\boldsymbol{x_n}) + (1 - r) \cdot W_w(\boldsymbol{x_w}) \tag{9}$$

$$X_n = \{x_{n1}, x_{n2}, \cdots, x_{ni}, \cdots\}$$
$$X_w = \{x_{w1}, x_{w2}, \cdots, x_{wj}, \cdots\}$$

这里，我假设对于给定的政策，“狭义福祉”与“广义福祉”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关联。如图3（a）所示，给定从集合 X_w 到集合 X_n 的映射 f （以及从集合 X_n 到集合 X_w 的逆映射 f^{-1} ），方程（9）可以使用公共变量向量 $\boldsymbol{x_w}$ 表示如下。

$$\begin{aligned} \boldsymbol{x_n} &= f(\boldsymbol{x_w}) \\ W &= r \cdot W_n \circ f(\boldsymbol{x_w}) + (1-r) \cdot W_w(\boldsymbol{x_w}) \end{aligned} \tag{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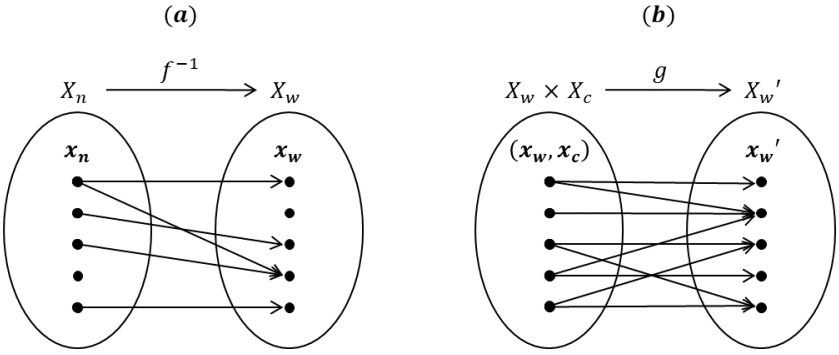

图3. 福祉要素集合的映射：(a) $X_n \xrightarrow{f^{-1}} X_w$ 和 (b) $X_w \times X_c \xrightarrow{g} X_w'$。

此外，如果针对某项政策，“狭义福祉”与“广义福祉”之间达成共识，即二者的语境相同，那么对于变量向量 $\boldsymbol{x_w}$ ，二者具有相同的函数，其权重 r 也将消失。方程（10）可改写为以下简洁的函数，对应图2(d)。

$$\begin{aligned} W_n \circ f &\equiv W_w \\ W &= W_w(\boldsymbol{x_w}) \end{aligned} \tag{11}$$

现在，我已从主体—客体多元主义、个体主体性—群体主体间性多元主义和“狭义—广义福祉”多元主义，以及政策与语境多元性（概念多元主义），转向“狭义—广义福祉”共识。然而，正如第1章所述，共识构建除了需要公平，还需要理性、效率和稳定性，并且需要联合事实查明[14,15]。正如第1章所述，人们很难判断由.....组合而产生的大量政策提案】【。

仅依据其主体性来判断各个要素，正如案例A和案例B所展示的，人们不可能仅依据其主体性来把握各个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尽管第2.1节提到，客观价值是人们通过协作与解释而认定为正确的主观价值，但有必要再次强调主体间性：所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都能够接受其为正确的共同事实，即客观共同事实。

因此，我假设共同事实会微扰地影响共识，而不是取代基于共同事实的“狭义—广义‘我们’”共识。如图3（b）所示，考虑从“狭义—广义‘我们’”的共同集合 X_w 与共同事实集合 X_c 的直积 $X_w \times X_c$ ，映射 g 到纳入 X_c 影响的集合X_w'，公式（11）可用向量 $\boldsymbol{x_w}$、$\boldsymbol{x_c}$ 和 $\boldsymbol{x_w}'$ 改写如下。

$$X_c = \{x_{c1},\ x_{c2},\ \cdots,\ x_{ck},\ \cdots\} \tag{12}$$

$$\begin{aligned} \boldsymbol{x_w}' &= g(\boldsymbol{x_w},\boldsymbol{x_c}) \\ W' &= W_w(\boldsymbol{x_w}') \end{aligned} \tag{13}$$

公式（13）的含义并非像构成多元主义那样列举一系列客观指标，而是将针对政策开展的联合事实查明纳入其中，以此解释福祉，同时强调概念多元主义中的主观语境。换言之，如图4所示，福祉$W' = W_w(\boldsymbol{x_w}')$以达成共识的主观价值 $\boldsymbol{x_w}$ 为主项，以基于联合事实查明得出的客观指标为扰动项$\boldsymbol{x_c}$。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狭义—广义‘我们’”共识下评估政策对福祉的影响，同时避免第1章所述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之间的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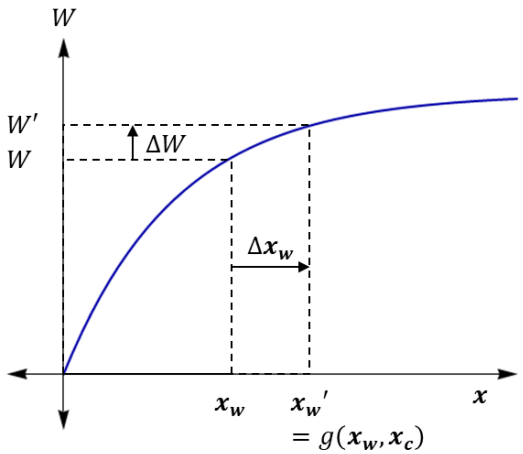

图4. 基于 WE 共识下联合事实查明的福祉政策评估方法。

请注意，公式（9）—（13）是用“狭义福祉”和“广义福祉”来表述的，但当涉及多种福祉时，可以将其扩展为多项式，并沿用之前相同的方法进行建模。公式（11）展示的是只有一个共识的情况，但也可以例如分别评估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共识，并进行比较，从而为整体制定更好的福祉政策。

3.2 政策评估方法的实践案例

本节根据公式（9）–（13），介绍一种在 WE 共识下评估政策的方法。图5展示了三个实践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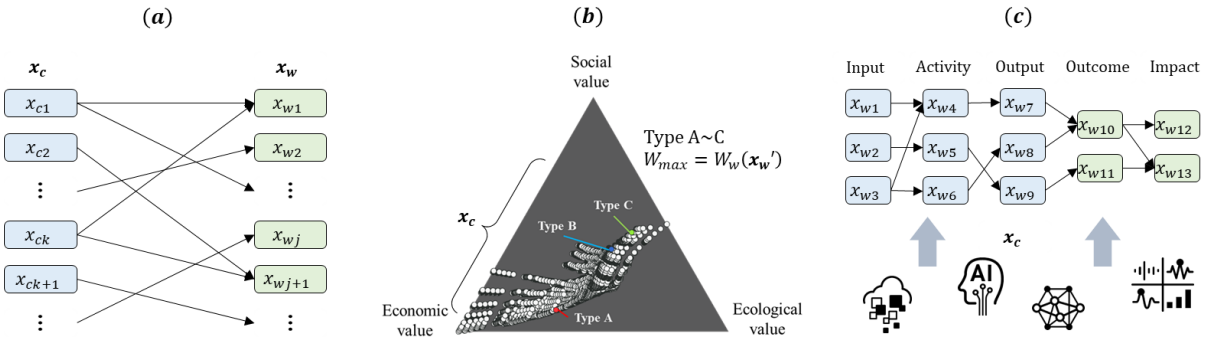

图5. 基于WE多元主义的政策评估方法：（a）事实—价值组合参数系统，（b）综合政策制定方法，以及（c）综合影响评估。

在图5（a）所示的事实—价值组合参数系统中，价值参数 $\boldsymbol{x_w}$ 与反映该参数的事实参数 $\boldsymbol{x_c}$ 通过网络相连接，以推断响应某项政策或对事实参数 $\boldsymbol{x_c}$ [11] 进行操纵时，价值参数 $\boldsymbol{x_w}$ 的变化。价值参数 $\boldsymbol{x_w}$ 是根据公式（9）和公式（10），将主观问卷（集合 X_n）中的 $f^{-1}\colon X_n \to X_w$ 映射至汇总结果（集合 X_w）而获得的，而 $\boldsymbol{x_w}$ 则根据公式（11）表示福祉 $W = W_w(\boldsymbol{x_w})$。可以合理地认为，该问卷隐含地假设了将使用汇总结果这一共识 $W_n \circ f \equiv W_w$。

事实参数 $\boldsymbol{x_c}$ 是用于联合事实查明的客观共同事实（集合 X_c），并且该参数被选择为与价值参数 $\boldsymbol{x_w}$ 具有关系。相比之下，在构成多元主义中，通用客观指标的列表是通过枚举确定的，从而与主观指标之间产生了差距，而此处使用的事实参数 $\boldsymbol{x_c}$ 则反映了概念多元主义中 WE 的语境。通用性与反映性之间存在权衡，而 $\boldsymbol{x_c}$ 在此明显倾向于后者。换言之，事实参数 $\boldsymbol{x_c}$ 的确定方式十分重要。

设置为反映价值参数 $\boldsymbol{x_w}$。根据价值参数 $\boldsymbol{x_w}$ 与事实参数 $\boldsymbol{x_c}$ 之间的关系$\boldsymbol{x_w'} = g(\boldsymbol{x_w},\boldsymbol{x_c})$，通过执行映射 $g\colon X_w \times X_c \to X_w'$，依据公式（13），使用 $W' = W_w(\boldsymbol{x_w'})$ 对政策进行评估。

在图5（b）所示的综合政策制定方法中，构建表示福祉的目标函数 $W = W_w(\boldsymbol{x_w})$，将表示政策的事实参数 $\boldsymbol{x_c}$ 与目标函数相结合，并选择使修正后的目标函数 $W' = W_w(\boldsymbol{x_w'})$ 最大化的政策[28]。目标函数 $W = W_w(\boldsymbol{x_w})$ 以福祉为目标变量 W，以社会、环境和经济等因素作为解释变量 $\boldsymbol{x_w}$，通过对主观问卷（集合 X_n）的汇总结果（集合 X_w）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而获得（对应公式（10）和（11）：$f^{-1}\colon X_n \to X_w$ 和 $W_n \circ f \equiv W_w$）。

事实参数 $\boldsymbol{x_c}$ 是针对各种政策运行参数进行多智能体仿真所得到的结果（集合 X_c）。根据运行参数组合数量的不同，可以获得数万个不同的结果，如图5（b）中三元图的白色圆圈所示。随后，根据公式（13），通过构建结合这些结果 $\boldsymbol{x_c}$ 与解释变量 $\boldsymbol{x_w}$ 的关系表达式 $\boldsymbol{x_w'} = g(\boldsymbol{x_w},\boldsymbol{x_c})$，从数万个可能的结果中选出使修正后的目标函数$W' = W_w(\boldsymbol{x_w'})$ 最大化的政策。图5（b）中的红色（A型）、蓝色（B型）和绿色（C型）圆圈表明，根据关系表达式 $\boldsymbol{x_w'} = g(\boldsymbol{x_w},\boldsymbol{x_c})$ 的不同构建方式，即对社会、环境和经济价值之间应强调何种平衡的不同表述，所期望的政策也会有所不同。

在图5 (c)所示的综合影响评估中，建立逻辑模型$W = W_w$（$\boldsymbol{x_w}$）以实现福祉，将代表政策的事实参数$\boldsymbol{x_c}$ 与逻辑模型相结合，并评估逻辑模型的产出——影响$W' = W_w$（$\boldsymbol{x_w'}$）[29]。如图5 (c)上半部分所示，逻辑模型通常用于描述和说明投入（资金和人员等投资）→活动（组织活动）→产出（产品和服务）→成果（产生的结果）→影响（旨在实现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变化）[30]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在推动社会企业发展时，投资者、地方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企业等会在利益相关者达成一致后创建逻辑模型，因此可以说它对应于公式（11）中的$W = W_w$（$\boldsymbol{x_w}$）。

对于与政策相对应的事实参数（集合 X_c），可以使用定量测量数据、基于统计处理的预测数据，以及类似于图5（b）中综合政策制定方法的多智能体仿真结果，并通过建立连接这些数据 $\boldsymbol{x_c}$与逻辑模型中变量 $\boldsymbol{x_w}$ 的关系 $\boldsymbol{x_w'} = g(\boldsymbol{x_w},\boldsymbol{x_c})$，评估与公式（13）相对应的政策的影响 $W' = W_w(\boldsymbol{x_w'})$。请注意，事实参数 $\boldsymbol{x_c}$ 通常会与逻辑模型的左侧相结合，因为逻辑模型通常越往左越具有主观性，直至分分彩

正确。此外，根据政策的不同，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也可能产生正面影响；对于多重影响，也可能同时存在正面或负面影响。政策的最终评估则由利益相关者决定。

通过上述三个示例，我展示了本文所提出的政策评估方法的现实意义和实用性。然而，在事实—价值组合参数系统中，设定能够反映价值参数的事实参数；在综合政策制定方法中，耦合目标函数的解释变量与模拟结果；以及在综合影响评估中，耦合逻辑模型与事实参数，都是决定能否更好地评估政策的关键。相关技术和技能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未来将在社区和自治市开展的田野调查中加以探讨。

4 结论

本文为探讨如何评估有助于福祉的政策，首先从主体—客体多元主义出发，并将其发展为个体—群体多元主义和WE多元主义。此外，通过将政策多元性纳入WE多元主义，并与WE共识下的联合事实查明相结合，提出了一种评估政策对福祉影响的方法。供参考，图6（a）和（b）再次以示意图分别展示了基于主体（概念性）—客体（构成性）多元主义和WE多元主义的政策评估方法。前者难以通过客观指标反映主观语境，而主观指标因人而异；后者则是由WE（主观地）就福祉达成共识，再结合WE能够接受、可能具有客观性的共同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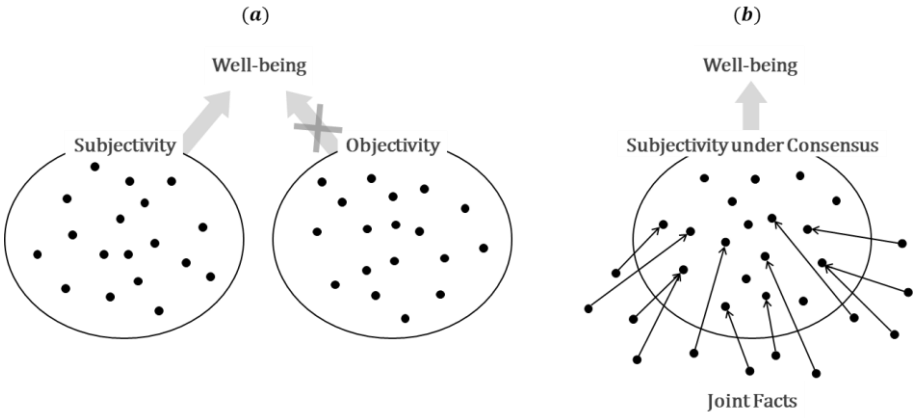

图6. 政策评估方法比较：（a）主体（概念性）—客体（构成性）多元主义，以及（b）WE多元主义。

最后，我将简要讨论本文的意义和未来课题。首先，通过从主体—客体多元主义发展到个体—群体多元主义，再到WE多元主义，并将概念多元主义的语境纳入其中，我避免了构成多元主义中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之间存在差距的问题。其次，我没有采用个体主体性与客观性的二分法，也没有仅限于个体主体性与群体主体间性，而是在自我—家庭—社区—市政当局—国家—世界这一层次序列中发展出“狭义—广义WE”概念，为评估涉及多元利益相关者的政策提供了新的基础。第三，我提出了一种结合WE共识与联合事实查明的政策评估方法，并通过展示实施案例说明其效用。未来的课题是通过田野调查验证本文的政策评估方法，并研究基于共识的主观价值与联合事实查明的耦合方法。不过，这种耦合方法将借助行为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等统计学方法，并继续探求主体间性和客观性的确定性。

补充说明

Fo为方便起见，我根据本文概要在此总结一系列方程。 per.

论证	方程	#
主体—客体多元主义	$W(x,p) = W_s(x,p) + W_o(x)$	(1)
个体—群体多元主义	$W(x) = W_s(x,p) + W_{is}(x,g)$	(2)
WE多元主义	$W(x) = W_n(x) + W_w(x)$	(3)
归一化	$W = r \cdot W_n(x_n) + (1-r) \cdot W_w(x_w)$	(7)
政策多元性	$W = r \cdot W_n(\boldsymbol{x_n}) + (1-r) \cdot W_w(\boldsymbol{x_w})$ $X_n = \{x_{n1}, x_{n2}, \cdots, x_{ni}, \cdots\}$ $X_w = \{x_{w1}, x_{w2}, \cdots, x_{wj}, \cdots\}$	(9)
映射	$f^{-1}: X_n \to X_w$ $\boldsymbol{x_n} = f(\boldsymbol{x_w})$ $W = r \cdot W_n \circ f(\boldsymbol{x_w}) + (1-r) \cdot W_w(\boldsymbol{x_w})$	(10)
共识	$W_n \circ f \equiv W_w$ $W = W_w(\boldsymbol{x_w})$	(11)
联合事实查明	$X_c = \{x_{c1}, x_{c2}, \cdots, x_{ck}, \cdots\}$	(12)

映射	$g: X_w \times X_c \to X_w{}'$ $\boldsymbol{x_w}' = g(\boldsymbol{x_w}, \boldsymbol{x_c})$	(13)
政策评估	$W' = W_w(\boldsymbol{x_w}')$	

致谢

在JST“有良知且敏捷的负责任创新”项目“社区智能化带来的ELSI的实践性考察与四维共创模式”中，我谨向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首席研究员Yasuo Deguchi教授致谢，感谢他的指导；向庆应义塾大学商学部Mobile WE小组负责人Shunsuke Sugimoto副教授致谢，感谢他就福祉和主体性提出的诸多宝贵建议；并向负责社区评价参数组的日立京都大学实验室致谢，感谢他们参与讨论。此外，我也感谢在日本当代与应用哲学学会第15届年会研讨会上参与讨论本文的各位。本研究得到日本JST RISTEX资助，资助编号JPMJRS22J5。

参考文献

[1] Diener, E. 和 Seligman, M.E.P. 2016. 超越金钱：迈向幸福经济。《公共利益中的心理科学》，5：1–31。https://doi.org/10.1111/j.0963-7214.2004.00501001.x[2] Frijters, P. 和 Krekel, C. 2021.幸福政策制定手册：历史、理论、测量、实施与案例。英国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https://doi.org/10.1093/oso/9780192896803.001.0001[3] Llena-Nozal, A.、Martin, N. 和 Murtin, F. 2019. 幸福经济：为人们的福祉和经济增长创造机遇。经合组织统计工作论文，2019/02。https://doi.org/10.1787/498e9bc7-en[4] 幸福经济联盟。2021.幸福经济政策设计指南。在线获取：https://weall.org/designing-public-policy（访问日期：2023年5月1日）。[5]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可持续发展。在线获取：https://sdgs.un.org/（访问日期：2023年5月1日）。[6] 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实现会议事务局。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日文版。在线获取：https://www.cas.go.jp/jp/seisaku/digitaldenen/index.html（访问日期：2023年5月1日）。[7] 智慧健康城市推进机构研究所。智慧健康城市。日文版。可在线获取

在线获取：http://www.swc.jp/（访问日期：2023年5月1日）。[8] 全球健康研究所。幸福与福祉指数。在线获取：https://globalwellnessinstitute.org/industry-research/happiness-wellbeing-index/（访问日期：2023年5月1日）。[9] 经合组织美好生活倡议。经合组织福祉指标汇编。在线获取：https://www.oecd.org/general/compendiumofoecd-well-beingindicators.htm（访问日期：2023年5月1日）。[10] 日本智慧城市研究所。宜居福祉城市指标：介绍与应用。日文版。在线获取：https://www.sci-japan.or.jp/LWCI/index.html（访问日期：2023年5月1日）。[11] Kato, T.、Miyakoshi, J. 和 Owa, M. 2022。市政评估指标中客观—主观指标的相关性与多元回归分析。京都大学研究信息库。http://hdl.handle.net/2433/277661[12] Mitchell, P. 和 Alexandrova, A. 2021. 福祉与多元主义。《幸福研究杂志》，2411–2433。https://doi.org/10.1007/s10902-020-00323-8[13] Ishida, S. 2022. 福祉的主客体混合理论之展望。日文版。《哲学》（Tetsugaku），73：119–133。https://doi.org/10.11439/philosophy.2022.119[14] Harashina, Y. 2011. 规划中的共识构建。载于《共识构建——理论、方法与实践》，日文版。Inohara, T. 编。日本东京：Keisoshobo。[15] Susskind, L.E. 和 Cruikshank, J.L. 2006. 打破罗伯特议事规则：主持会议、达成共识并取得成果的新方法。英国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参见 https://doi.org/10.1111/j.1571-9979.2006.00106.x[16] 伍达德, C. 2013. 福利理论分类。《哲学研究》，165：787–803。https://doi.org/10.1007/s11098-012-9978-4[17] Deguchi, Y. 2012. 如果科学哲学家为社会心理学提出一种方法论：预告。载于《科学化心灵与社会》，日文版。Karasawa, K. 和 Todayama, K. 编。日本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8] Deguchi, Y. 2012. 作为测量网络的社会心理学。载于《科学化心灵与社会》，日文版。Karasawa, K. 和 Todayama, K. 编。日本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 Otsuka, J. 2020. 统计学哲学化。日文版。日本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社。[20] Deguchi, Y. 2020. 从“自我即我们”视角看后新冠时代。载于《超越智慧生活》，日文版。日立京都大学实验室编。日本东京：日经BP。[21] Deguchi, Y. 2022. 从“无能力”到 WE 转向。日文版。《思想》，1179：2–4。在线获取：https://www.iwanami.co.jp/news/n47917.html（访问日期：2023年5月1日）。[22] Kagan, S. 2009. 将福祉视为享受美好事物。《哲学论丛》，23：253–

272. https://doi.org/10.1111/j.1520-8583.2009.00170.x[23] Sarch, A. 2012. 幸福感的多要素理论及其结构。《太平洋哲学季刊》，93：439–471。https://doi.org/10.1111/j.1468-0114.2012.01434.x[24] Stott, P.H. 2006. 累积前景理论的函数形式分类。《风险与不确定性杂志》，32：101–130。https://doi.org/10.1007/s11166-006-8289-6[25] Lobel, R.E., Klotzle, M.C., Silva, P.V.J.G. 和 Pinto, A.C.F. 2017. 前景理论：巴西函数形式的参数分析。《企业管理评论》，57：495–509。https://doi.org/10.1590/S0034-759020170507[26] Hiroi, Y. 和日立京都大学实验室。2021. 面向碳中和的区域政策仿真方法开发——IT系统支持地方政府和企业为实现可持续社会而进行多维决策。日文版。在线获取：https://www.kyoto-u.ac.jp/ja/research-news/2021-06-08（访问日期：2023年5月1日）。[27] Nakahara, S. 2018. 基本收入在社会保障中的重要性。日文版。《经济政策研究杂志》，14：73–92。在线获取：https://www.ec.kagawa- u.ac.jp/~tetsuta/jeps/no14/nakahara.pdf（访问日期：2023年5月1日）。[28] Owa, M., Miyakoshi, J. 和 Kato, T. 2023. 主客观政策制定方法（SOPMA）：居民价值观多元回归分析与价值指标多智能体仿真的结合。（即将发表）[29] 日立京都大学实验室。2022. 日立京都大学实验室：运用逻辑模型进行社会影响评估。日文版。《日立评论》，104：147–148。在线获取：https://www.hitachihyoron.com/jp/archive/2020s/2022/01/pdf/2022_01_22.pdf（访问日期：2023年5月1日）。[30] Epstein, M.J. 和 Yuthas, K. 2014. 衡量和改善社会影响：非营利组织、企业和影响力投资者指南。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Berrett-Koehler出版社。

作者信息

Takeshi Kato 日立京都大学实验室，京都大学开放创新研究院，日本京都
kato.takeshi.3u@kyoto-u.ac.jp